

论海德格尔“德国古典哲学阐释”的开端

张 柯

内容提要 海德格尔的教授资格论文《邓斯·司各脱的范畴学说与意谓理论》是其持续一生的“德国古典哲学阐释”的正式开端。在这部论文中,海德格尔以洛采“有效性”问题为主导思路,力求把经院哲学带到黑格尔哲学的“近处”,最终得以把传统的“范畴问题”和“意谓理论”转化为“存在之区分”与“存在之关联”这两个问题向度,由此不仅达成了其“黑格尔阐释”的开端,更因这两个问题向度的关键性而为他整个的“德国古典哲学阐释”奠定了开端根据。

关键词 海德格尔 德国古典哲学 黑格尔

张 柯,贵州大学哲学系教授 550025

自其思想启程以来,海德格尔就开始了对德国古典哲学的阐释与争辩,这首先突出地体现在《早期著作》(GA 1)收录的早期文本中。这批早期文本(1910-1916)见证着海德格尔“德国古典哲学阐释”的开端,这一开端所呈送出的东西,通过不断的酝酿与激荡,在二十年代中后期形成了海氏“德国古典哲学阐释”的一个整体高潮(GA 21、GA 25、GA 26、GA 28、GA 3),在此基础上构成了一系列不断深化的阐释(GA 32、GA 41、GA 42、GA 49、GA 68、GA 10、GA 11、GA 84、GA 86),最终使得人们可以臻于这样一种深切观照:海德格尔的思想之路,本身就是一条对德国古典哲学的阐释之路。

另一方面,尽管这一开端中已经蕴含了关键性的东西,但较之此后成熟时期,这一开端仍有其晦暗之处。这一情形的根源在于这一阐释工作的复杂性和深刻性。它在本质上乃是一种奠基于具体工作之上的整体性的阐释,是以特定问题(根据律问题)为主线展开的对莱布尼茨、康德、德国观念论哲学的共同沉思,无论在规模上还是深度上都至为宏大深远,当然并非一蹴而就之事。

从细节来看,在这个开端中,我们看到的只是海氏“黑格尔阐释”的一种决定性的启程,对于康德等人,早期海氏还没有真正切入其各自相宜的决定性视域。但从长远角度看,使海氏“黑格尔阐释”得以开端的那种东西,恰恰通过其对关键向度的确立而为海氏整个“德国古典哲学阐释”奠定了开端根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海德格尔对德国古典哲学的整体评判研究”(14XZX014)、贵州大学哲学学科群重点建设项目的阶段性成果。

据。对此复杂情形的阐明正是本文之任务。

一

就德国古典哲学视域而言,早期海氏主要关注的是康德与黑格尔,对莱布尼茨、费希特以及谢林都极少论及。事实上,海氏对莱布尼茨哲学之意义的“发现”和对费希特哲学之深度的“重估”以及对谢林哲学之核心的“深究”都是在此后的思想道路(二十年代中后期)中逐渐发生的。

早期海氏对康德哲学的兴趣显得非常突出,例如在《早期著作》的五篇书评中就有三篇是直接讨论康德的,但此时的海氏显然还没有发现康德哲学的真正位置,他把康德归置于“现象主义”的做法^[1],认为实在性问题“在康德认识论中找不到任何位置”的立场^[2]都可以表明这一点。但另一方面,此时又有某种关键因素正在萌发,此即:海氏开始关注起“亚里士多德—康德”这一“思想通道”^[3]。这一“思想通道”在日后的打通对于海氏的“德国古典哲学阐释”将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早期海氏的这种关注努力,很可能是受到了拉斯克的影响,因为海氏已经清楚地看到,拉斯克凭借着他的谓词理论“试图把亚氏和康德带到一种尽可能近的彼此切近中”^[4],而且敏锐地看出,“拉斯克在先验哲学的意义上所力求的那种东西,恰恰是盖瑟尔在亚氏的基础上和相关道路上所试图获得的东西”^[5]。

然而这种关注在此时还仅仅是保留为一种可能性。相比之下,早期海氏对黑格尔的研究却已经呈现出一种深远辽阔的局面。

海氏的教授资格论文《邓斯·司各脱的范畴学说和意谓理论》虽然表面上的主题是对司各脱哲学的探讨,但其实质性的问题机制却指向了与黑格尔哲学的争辩。整部论文不仅是以黑格尔的箴言开篇,而且是直接以与黑格尔哲学的“争辩”之宣告结尾的:

活生生之精神的哲学,真切之爱的哲学,崇敬着之神之热忱的哲学,对于它们的最普遍的基准点这里只能略加暗示,特别是当我们考虑到,一种从它们的基本倾向中导出的范畴理论所面临的任务是如此艰巨时,我们更是只能如此选择。这一任务的艰巨性体现在:这种范畴理论要进行一种原则性的争辩,其对手则是在幅度、深度、体验之丰富性以及概念塑形上都至为强大的一种历史世界观体系,这一体系把此前所有基本的哲学问题主旨都扬弃于自身中了;也就是说,要同黑格尔展开一场原则性的争辩。^[6]

这一表态明确宣告了其“黑格尔阐释”的开端。但在对这一开端进行深入阐释之前,有必要先考察一下通向这一开端本身的历程,亦即追问海氏是如何走向这一开端的。而要对此进行追踪,就不能不提及一些关键人物的引领作用。这将使我们看清:海氏思想为何在开端阶段就与“德国古典哲学阐释”密切相关。

二

1957年,海氏曾如此回顾了他早年道路中的关键因素:1910—1914年间,他“对黑格尔和谢林的兴趣日益增长”,而且,还有两位关键教师的引导:

对我此后本己的大学教学活动而言,那种对之有决定性作用并因而无法言传的东西,乃源出于两位先生,在此我要特意道出他们的名字,以示纪念和感谢:一位是系统神学教授卡尔·布莱格,他是图宾根思辨学派传统的最后代表,这一学派通过与黑格尔和谢林的争辩而

[1][2][3][4][5][6]Martin Heidegger, *Frühe Schriften*, GA 1, Frankfurt: V. Klostermann, 1978, S.9, S.3, S.49—53, S.33, S.34, S.410—411.

赋予了天主教神学以重要地位与开阔远景;另一位是艺术史学家威廉·弗戈。这两位教师的每一节讲座课都会从始至终地激荡着我的那些漫长的学期假,受之影响,……我总是持续不断地工作着。^[1]

布莱格在青年海氏心中激起了其对谢林和黑格尔哲学的兴趣,对此,海氏在另一文献中回忆道:布莱格的那种透彻的运思风格令他深为着迷,从布莱格那里,他“第一次了解到谢林和黑格尔对于思辨神学的重要性。就这样,存在论与思辨神学之间的那种张力便作为形而上学的构造而进入了我的探求活动的视野中”^[2]。

这一问题域显然具有深远意义,因为这种“张力”将会成为海氏日后对德国古典哲学进行整体评判时的一个主要线索,此即:形而上学的“存在论—神学”机制;但其更直接的作用却在于它影响了海氏教授资格论文的思路:把经院哲学带到黑格尔哲学的“近处”。这一影响源出于布莱格思想的基本立场。

布莱格主张应把德国观念论与经院哲学有机地结合起来。他是莱布尼茨和洛采思想的忠实辩护者。莱氏被视为经院哲学的传承者和德国观念论的先驱,观念论的进路必须在莱氏思想中才能得到真正澄清,而作为德国观念论的继承者,洛采思想则有助于在当前处境中理解传统的丰富意义;在如何面对经院哲学遗产的问题上,布莱格赞同司各脱而反对阿奎那,更确切地说,在“存在问题”上,他赞同司各脱的“一义性”理论而反对阿奎那的“类比”学说,“一义性”更为真切地应合了存在问题之“同一与差异”的微妙事态,他在其专著《论存在:存在论概要》中因而写道:“存在之根据并不能在可感的存在者中找到,但它却是通过可感的存在者而显现,穿透它们并使之得以可能”^[3]。

布莱格的这种内在于传统以展开超越性对话的哲学立场,对司各脱思想的高度肯定,以及对“存在问题”的深邃沉思,都对年轻的海德格尔产生了影响。而且按海氏的回顾,布伦塔诺的博士论文激发起了他对存在问题的关注,布莱格的存在论专著则为他提供了第一种研究视野和理解框架^[4]。

但布莱格对于海氏最重要的指引之功,却在于下述事情:青年海氏正是在布莱格的指引下才去研究洛采和胡塞尔的^[5]。对洛采思想的发现对于海氏具有决定性意义。四十年代时一位学生问海德格尔,应怎样学哲学?海德格尔告诉这位学生,应去读洛采的那部深奥费解的《逻辑学》,并且解释了给出这一指示的根本意图:“我想让您明白,我必须努力穿越什么才为我的一切打通了道路”^[6]。在“思想日记”性质的《黑皮笔记》中,海氏更是反复道说了这一点:“洛采保持了德国哲学最丰富的传统……我从我的学生时代以来就一直热爱着他,并且,尽管有不断增多的不一致性,我却愈发地热爱他”^[7];“洛采的《形而上学》还处在黑格尔和谢林的思辨传统之中……它和布伦塔诺的博士论文是我这么多年来一直热爱的书并且今天我还喜欢钻研它们。它们对我而言乃是通向伟大思想家之著作的第一等路标;对我而言,此外没有其他任何人给我指示过这样的道路。并且只是后来我才觉察到,李凯尔特和胡塞尔这些教师都是以完全不同的方式被洛采所规定的,就连布伦塔诺也处于洛采的‘影响’之下。”^[8]

布莱格和洛采的思想具有同一指向,即对德国古典哲学的超越性继承。由此我们就可以理解,受

[1] Martin Heidegger, *Frühe Schriften*, GA 1, Frankfurt: V. Klostermann, 1978, S.56–57.

[2][4][德]海德格尔:《面向思的事情》,陈小文、孙周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78页,第77页。

[3] Carl Braig, *Vom Sein: Abriß der Ontologie*, Freiburg: Herder, 1896, S. 5.

[5] Martin Heidegger, *Reden und andere Zeugnisse eines Lebensweges*, GA 16, Frankfurt: V. Klostermann, 2000, S. 41.

[6] G. Neske (Hrsg.), *Antwort: Martin Heidegger im Gespräch*, Pfullingen: Neske, 1988, S. 179.

[7] Martin Heidegger, *Überlegungen II–VI*, GA 94, Frankfurt: V. Klostermann, 2014, S. 481.

[8] Martin Heidegger, *Anmerkungen I–V*, GA 97, Frankfurt: V. Klostermann, 2015, S. 470.

其深刻影响的海氏思想为何在开端阶段就与“德国古典哲学阐释”密不可分。早期海氏所得到的这些指引之功和激发作用,首先就汇聚到了教授资格论文中,它被包括伽达默尔在内的许多学者视为海氏思想的真正起点。这部论文同时也是海氏“黑格尔阐释”乃至“德国古典哲学阐释”的正式开端。但一部顾名思义研究经院哲学的论文何以是其“德国古典哲学阐释”的开端?原因首先在于其极为独特的研究思路:要在“当前化”中实现“历史性思想”的彼此切近。

三

海氏的教授资格论文出版于1916年,其特立独行的研究思路给当时学界留下了深刻印象:“这本书首先并没有遵循历史的观点,而是,通过作者内在地深入于与一个极端敏锐的思想者的思想交锋中,试图形成并解释作者自己的思想。因此,司各脱的思想的形成与他的前辈以及同时代人的关系的考察几乎被置于不顾;相反,司各脱与现代的思想家之间的种种联系,如他与洛采、胡塞尔和拉斯克的关系,却给予了关注”(泽贝格);“作者要根据一种新的方法进入经院哲学,并通过现代的体系化的解读来填补哲学—历史学的解读。尽管计划研究方式并不是闻所未闻的,但是到目前为止还尚且没有以如此的坚定决心来处理某个单独的对象”(迪罗夫);“海氏最后达到的结论是,司各脱的哲学已经超前地看到了一系列的逻辑观点和现时代的问题,无论如何,该研究都毋庸置疑地指出,在现代的哲学中暗藏着许多中世纪的及经院哲学的思想”(费尔德曼)^[1]。

这些同行的观察大致上并没有偏离海氏本人的意图,在1917年1月17日致马丁·格拉布曼的信中,海氏曾自我解释道:“唯一的目标是:将经院哲学的系统性内涵放到一个合适的类型中。我知道,在这个过程中我并没有冒下述危险:即不加说明地,把所说的经院哲学的精神财富,加工到司各脱的问题框架中去。但我确信,共同的精神财富一定会受到独立的哲学家们以及他们自己最内在理论之批判的检验。”^[2]

也正是基于对“精神财富之共同性”的确信,这部论文坚决地走上了一条对经院哲学予以“当前化”的道路,这种当前化不是简单的照搬和对比,而根本地是一种思想之“争辩”;这种作为争辩的“当前化”也不仅仅是对经院哲学、德国观念论乃至当代哲学的对映思考,更是要通过经院哲学一路回行到亚里士多德那里,因为“亚里士多德的真正精神贯彻了经院哲学”^[3]。海氏事实上已经在沉思一条历史性的通道,在这条通道上,所有本质性的东西都聚集起来了。所以,在这部论文的开篇处,海氏特意地引用了黑格尔的一句话来作为全文“箴言”:“……就哲学的内在本质而言,既无先驱者亦无后至者”^[4]。

相较于结尾处宣告的与黑格尔的“争辩”,开篇处的这句“箴言”更精炼地揭示出了这部论文的基调:“当前化”。一切思想都应“当前显现”,都应在“当前”展开一场本质性的争辩。在思想的事业中,既无先驱,亦无后至,一切都归属于思想之所用。也正因此,在这部论文中,当14世纪的司各脱(主义)之思想与19世纪的洛采之思想一道当前显现、甚至互相注释之际^[5],作者本人却觉得其乃自然之事。

洛采思想成为了这部论文得以实施其“当前化”策略的关键。事实上,不仅这部论文,更早之前的博士论文《心理学主义中的判断理论》也完全是在洛采思想的主导性影响下完成的。海氏后来指出:“博士论文是对有效性的追问……此论文乃是一种对洛采的偏爱,它自身却未得以澄清。”^[6]而对于教授资格论文,海氏后来承认他是根据洛采对现成性和有效性的区分这一核心思想才完成了这项研究

[1][2][法]登克尔等编:《海德格尔与其思想的开端》,靳希平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第83-94页,第77页。

[3][4][5]Martin Heidegger, *Frühe Schriften*, GA 1, Frankfurt: V. Klostermann, 1978, S.201; S.193; S.307-309, 314-315, 323-324.

[6]Martin Heidegger, *Besinnung*, GA 66, Frankfurt: V. Klostermann, 1997, S. 411.

的关键思辨^[1]。

然而这与海氏的“黑格尔阐释”有何关联？关联在于，教授资格论文的运作机制是以洛采思想来重释司各脱思想，而洛采哲学的真正意义，则被海氏思为对黑格尔哲学的关键传承。也就是说，这部论文事实上是以洛采为中介实现了经院哲学与黑格尔哲学的切近。这一经院哲学研究之所以是“黑格尔式的”，根本地乃是因为，它是“洛采式的”，所有这些都在论文中有耐人寻味的呈现，否则我们就无法理解这一复杂现象：一部探讨司各脱的专著为何既是以洛采的有效性思想为主导思想，同时又是以黑格尔的历史精神为支配精神。

从“当前化”的基本立场而来，“有效性”思想在教授资格论文中如此施展了它的主导作用：它让海氏发见了不同时代之思想的同一性，并通过司各脱的思想文本来道说他所领会的深刻义理，即，要区分实在物的实际性和非实在物（逻辑性事物）的实际性，并且要深思和凸显后者的关键意义；而黑格尔所思考的历史，根本地就是后一种东西即逻辑性东西的实际性（*Wirklichkeit*），如此就导致了这部论文的内在精神乃是黑格尔式的历史精神。思想的历史性因而就显现出来，从司各脱到黑格尔再到洛采，他们的思想要义具有深刻的同一性。

但这种同一性究竟意味着什么？它与海氏“德国古典哲学阐释”的开端有何关联？我们将通过对文本思路的分析来进一步揭示。

四

这部教授资格论文由“范畴学说”和“意谓理论”两部分构成，按海氏自己的理解，前者实质上是在探讨“存在”问题，后者实质上是在追问“语言”问题。

海氏对前一问题的重视自不待言，而且第一部分“范畴学说”就是根据洛采的“有效性”思想（现成性和有效性的区分）来追问存在之区分，它首先意味着对各种实际性领域的区分，并在这种区分中趋向“与存在者有别的存在”^[2]。

但后一问题究竟意味着什么？细读过这部论文的人会发现，海氏恰恰是想把“意谓理论”拨擢出单纯的语法现象之外，尽管它讨论了包括名词、动词、代词在内的大量语法现象。关于这一点，海氏在《作者自述》中已有清晰的指示^[3]。海氏在正文中也讲得很清楚，对“意谓理论”的讨论就是要区分“实存着的语法性东西的领域”和“有效着的逻辑性东西的领域”^[4]，并应在后一领域中来探讨意谓问题。“意谓并没有断言某种关于对象的东西，而仅仅是表象了它，仅仅是包含了一棵树之所是，而不是包含了它存在这一事实。意谓因而显得是与实在相脱离的，被意指的对象是否实存、变动还是消失，意谓始终不被这种变化所影响”，“对于意谓而言，实存完全是陌生的”，为此，海氏引用了司各脱在《论亚里士多德〈解释篇〉诸问题》中的一句话，“对于被理解的东西而言，被意指的东西的实存是外在于它的”，并称赞司各脱的这种思想具有“足够的本源性和重要性”，认为司各脱所教导的乃是“意谓领域之独立于现成存在的自由”^[5]。海氏由此指出，意谓问题并非仅是语法问题，它事实上更接近逻辑学，因为“在意谓本身中必然已经存在着一种形式内容，正是它使得意谓之功用得以可能。如此，意谓就被置于逻辑之尊严的视角之下了”^[6]；最终，海氏断言，“通过意谓范畴与判断意义之间的这种关系，……意谓理论因而就进入了一种与逻辑学的最为切近的关系中”^[7]。

使意谓问题超离语法而进入逻辑学，由此确认意谓问题的独特性，这是海氏在意谓问题上的第一

[1] Martin Heidegger, *Logik*, GA 21, Frankfurt: V. Klostermann, 1995, S. 62.

[2][3][4][5][6][7] Martin Heidegger, *Frühe Schriften*, GA 1, Frankfurt: V. Klostermann, 1978, S.207–265, S.412, S.295, S.301–302, S.307, S.338.

种立场,但这一立场本身却又是对第二种立场的准备。

在意谓问题上,海氏的第二种亦即更为基本的立场乃是:意谓问题乃是关联问题,是有别于实在之关系的本源性的“关联”。这种关联行为的特点在于“有效”。“意谓之研究的主导价值因而就是作为有效着的意义的真理”^[1]。海氏因此在司各脱的文本中看到了直接通向由洛采、胡塞尔等人所决定性地塑形的“当代”哲学问题处境的关键思考:“意谓并非心理的实在,意谓也不属于一种实在的关联,并不是在这种关联中被造成的;意谓必须被理解为意向性内容,被理解为意向行为(通过灵魂所引发的意向)的成果。相对于被单纯感知的语词,被理解的有意义的表达是更多的,这种更多就存在于意谓行为中”^[2]。这种意谓理论因而构成了对海氏哲思道路上的那个开端性的问题——“倘若‘存在’是在多重意谓中被道说的,那么哪一种意谓(Bedeutung)是那种主导性的基础意谓呢?何谓存在?”——的一种真切回应:意义的多样性来自意谓(意义)行为的统一性,意谓(意义)行为乃是“关联”(Beziehung)。存在之意义问题乃是存在之关联问题。存在乃是一个及物动词,而非一个抽象名词,存在之意义(意谓),就是存在之关联,但这种关联,既非心理现象,也非实在之关系,而是某种本源性的“关联”。

正是在洛采的影响下,海氏把这种本源性的“关联”思为“有效”,而为了阐明这种与实在物之现成性有别的“有效着的真理”,首先有必要在“范畴学说”中区分各种实际性领域,亦即,“对那些最普遍的对象规定性本身和那些具体的领域(逻辑的、数学的、物理的、心理的和形而上学的实际性)作出阐释性的特性规定”^[3],而这恰恰就是海氏的这部教授资格论文第一部分的任务^[4]。

因此,海氏事实上是对洛采的“有效性”思想进行了两种向度的解读:其一,作为“区分”之思的“有效性”;其二,作为“关联”之思的“有效性”。他正是凭借这两种向度分别进行了对“范畴学说”和“意谓理论”的深化和转化:前者实质上乃是“存在之区分”问题,亦即在存在者领域的区分中趋向一种本源性的区分,即存在与存在者的区分;后者实质上乃是“存在之关联”问题,亦即作为存在之意义、存在之真理的关联。而且对后者的理解应以前者为基础,因为对本源关联的追问显然需要一种根本性的区分为前提。这不仅是这部论文思路的关键之处,即“先来探讨范畴学说并使之成为意谓理论的理解基础”^[5],而且将成为海氏后来兴起的“形式显示”思想的关键。

教授资格论文的问题向度因而在实质上就是“存在论差异”与“存在与人之关联”这两个问题向度的雏形。着眼于这两个向度对于海氏整个思想道路的决定性意义,我们终于可以看清这部论文的开端性意味,即它何以不仅是海氏“黑格尔阐释”的开端,更是海氏整个“德国古典哲学阐释”的开端。

海氏在四十年代的《黑皮笔记》中回顾道:教授资格论文有许多缺陷,但其研究方法及精神是可取的,这是一次冒险,因为这一工作事实上是将经院哲学“带到黑格尔形而上学的近处”,这种“当前化”的做法在今天可能习以为常,但在当时却极为触目,甚至被视为“奇端异说”^[6]。当事人的这一定位,加上论文结尾处对“争辩”的宣告,确凿地指明了教授资格论文就是其“黑格尔阐释”的开端。

但海氏接着又指出,这种反常规的“奇端异说”还不是本质性的东西。因为真正本质性的东西在于下述两种思想的启程:“‘范畴理论’寻求的存在者之存在,即这样一种经验:存在本身始终是未被思的。‘意谓理论’寻求的是语言之本质,即这样一种经验:语言威临而不是‘表达’,语言乃是存在之威临和存在之真理。”^[7]对“存在本身始终未被思”的经验乃是对存在之遗忘状态的经验,“范畴理论”因而指向了“存在论差异”。对“语言乃是存在之威临和存在之真理”的经验乃是对“存在之关联”的经验,“意谓理论”因而指向了“存在与人之关联”。

[1][2][3][4][5][6][7]Martin Heidegger, *Frühe Schriften*, GA 1, Frankfurt: V. Klostermann, 1978, S.307, S.308, S.412, S.207-289, S.212, S.287, S.288.

这两个问题向度的启程才是决定性的,这同时也就意味着,教授资格论文不仅仅是其“黑格尔阐释”的开端,更是其整个“德国古典哲学阐释”的开端。因为海氏的“德国古典哲学阐释”乃是围绕“有限性与无限性”即“康德哲学与德国观念论”这一“十字路口式的”核心问题展开的,它在实质意义上为“存在论差异”和“存在与人之关联”这两个问题向度所贯彻,并且其中任何一个向度都必然同时指向了另一向度。

通过洛采的中介作用,通过对黑格尔哲学的沉思,海氏在教授资格论文中把逻辑学理解为历史精神,理解为生发着意义的精神生命,因此,被从语法现象中抽离出来而归置于逻辑学的“关联问题”乃是精神之历史问题,是精神之生命问题。如此也就毫不奇怪,为何是这部论文开启了与黑格尔的“争辩”。因为这部论文缘起就在于对“精神历史”概念的深入领会。这一点早已在海氏1915年的简历中得到了揭示:

我的下述工作,对费希特和黑格尔的研究,……共同导致了这一后果:我身上的那种对历史的反感被彻底地摧毁了,……使我的下述工作变得方便了,即:为把经院哲学彻底地建造为一种必须得到正确估价的哲学而更加深入地钻研中世纪哲学。对我而言,这种钻研首先较少地存在于对各个思想家之间的历史学关系的突显中,而更多地在于一种阐释性的理解中,即凭借现代哲学的手段而对中世纪思想家们的理论内容所作的一种阐释性的理解。如此就形成了我对司各脱之范畴学说和意谓理论的研究。^[1]

正是通过教授资格论文,通过如此规划的与黑格尔哲学的争辩,海氏走上了一条追问“存在与人之关联”问题的道路,根源于《精神现象学》而非狄尔泰哲学的“生命”概念以及此后转化而成的“此在”概念,也注定会先后成为这条道路上的关键路标。

由此可见,海氏的“黑格尔阐释”在其开端处就已运作在“存在之关联”问题向度。但反过来说,只要海氏在教授资格论文中就已经认识到,深刻的历史性乃是同一性,并且意谓理论(存在之关联)的理解基础乃是范畴理论(存在之区分)^[2],那么,如此开端的“黑格尔阐释”就必然要求着一种同样深刻的“康德阐释”作为其理解基础,哪怕后者此时还仅仅保留为一种可能性。这最终也就意味着,只要教授资格论文是海氏“黑格尔阐释”的开端,它也就必然是其整个“德国古典哲学阐释”的开端。

〔责任编辑:曾逸文〕

On the Beginning of Heidegger's "Interpretation of Classical German Philosophy"

Zhang Ke

Abstract: "Duns Scotus' Theory of Categories and of Meaning" (Habilitationsschrift) is the real start of Heidegger's lifelong "interpretation of Classical German Philosophy". In this paper, in the problem-oriented thinking of Lotze's "validity", Heidegger strove to bring Scholasticism near to Hegel's philosophy and finally transformed the traditional category-problem and meaning-theory into the question of "distinction of Being" and "relation of Being", thereby not only making the paper the start of his "Hegel-interpretation", but also laying the foundation for his whole "interpretation of Classical German Philosophy".

Keywords: Heidegger, Classical German Philosophy, Hegel.

[1][2]Martin Heidegger, *Frühe Schriften*, GA 1, Frankfurt: V. Klostermann, 1978, S.39, S.212.